

# 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之商榷

● 胡 成

起於1840年鴉片戰爭，迄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110年歷史，大陸學術界，尤其是在1954年後，一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予以概括。80年代以來，這一久爲人所沿用的框架開始受到挑戰，其不同意見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 一 正面批評

如李澤厚認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究竟是甚麼意思不清楚。他問道，這個「半」如何規定？有多少數量統計資料作爲依據①？還有人認爲這不是一完整概念，「半殖民地」指國家地位，「半封建」指社會形態。

## 二 補充修正

如李時岳在此概念基礎之上，進一步把近代中國描繪爲向下沉淪，又向上發展的過程②；陳旭麓、馬敏等強調這一概念的過渡特徵③；夏東元則把資本主義的醞釀、發生和發展作爲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④。

## 三 另闢蹊徑

如龐樸認爲喧囂一時的政治風雲很快便會從記憶中漾去，積澱下來的只是文化類型，因此近代中國更爲深刻的還是因文化結構逐步展開的文化衝突⑤；姜義華則把近代中國概括爲二元或多元結構⑥；徐泰來認爲資本主義近代化是近代中國的發展線索⑦。

##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學術意義是不完整和狹窄的

對近代中國社會特徵率先進行理論抽象的，是梁啟超1901年刊行的《中國史敘論》。該文以「上世」、「中世」、「近世」作爲中國歷史的分期。所謂「近世」乃

指乾隆末年以來，中國作為世界意義的中國，中華民族同全亞洲各民族一起與西方交涉互爭的時代；是專制君主漸湮沒，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燴代興起的時代。在這一框架之下，他以「捫虱談虎客」的筆名撰寫了第一部《中國近代史》。這是一個突破，用梁先生的話言之，中國歷史學家已不再僅局限在「追述三代之禮，存前聖之業」的樊籬之中，而開始尋求歷史演化的公理和法則。在「新史學」的感召之下，蕭一山、蔣廷黻等人在治中國近代史時都有自己的理論框架。

到本世紀初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一批學者開始有意識地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歷史。列寧在1920年6月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所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1922年1月在遠東各國和民族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為中國所接受，並被引進。它首先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為社會主義制度在大陸的確立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30年代以後這一概念進入學術界，作為一家之言也確實把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但隨着歷史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意義上的缺陷日益明顯，主要表現為：

### 一 它不是一個關於近代中國社會特徵的完整概念

首先這兩個「半」是甚麼詞性，誰也不知道。顯然它們不是數詞，因為沒有統計數字作為依據。這樣它們就有可能是程度副詞或形容詞，其涵義即如大陸學者李時岳所云：「近代中國，就國家地位而言，既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沒有完全（至少在形式上）喪失獨立，故稱之為半殖民地；就社會形態而言，雖然發生了資本主義，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只是在形式上），但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專制統治仍然保持着，故稱半封建。」<sup>⑩</sup>這就是說這兩個「半」均是相對於自己的「完全」而言的。例如「半殖民地」相對於殖民地，即獨立前的印度、非洲和拉美的某些地區或國家；「半封建」則相對於封建，即1840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但另一方面，「殖民地」也具有社會形態的意義。在馬克思那裏，社會形態是指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所構造的一種有歷史界限的結構。而《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殖民地」條也認為，殖民地就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大擴張後出現的，



那些被佔領、被奴役、被瓜分地區經濟和社會結構、政治體制、乃至人們心理狀態的一種依附形式<sup>⑩</sup>。這就是說在這一框架之下，近代中國的社會形態是由兩個並列的「半」構成的，因此它所含的意義只是告訴我們一事物的兩個方面，這事物究竟是甚麼仍不得而知。所以，倘若強調它的「過渡」意義，可這兩個「半」均相對於各自的「完全」，概念本身所給出的只是「半殖民地」向「殖民地」的前進，「半封建」向「封建」的後退，這和歷史實際發展不符。退一步來看，即使「半殖民地」指國家地位，「半封建」指社會形態，那麼這二者就應是遞進關係，因為國家地位是具體、反映事物的某一方面；社會形態是抽象，反映事物的整體面貌。這樣一來，並列結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就變成了偏正結構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這又和許多認同這一概念的學者的表述相悖，因為在他們看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一同時展開的過程，殖民地特徵的進一步加深同時意味着封建社會的進一步解體，而「半殖民地的半封建」所表示的只是近代中國半封建的一個特徵，「半殖民地」是修飾「半封建」的，兩者不是「同時」並存的。

## 二 它是一個束縛史學家視野的概念

在這裏，階級鬥爭被視為貫穿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線索，受關注的只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步一步地進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過程。這樣豐富的歷史被簡單地公式化，正如龐樸所說：「中國近代史直觀地描繪為鬥爭史、反抗史。」<sup>⑪</sup>文革以前姑且不說，即使到80年代末其慣性影響力仍然未減。大陸的近百種版本的《中國近代史》大部分篇幅就都是鬥爭史和反抗史，而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普通百姓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匱乏。這種現象自然不能歸咎於研究者知識水平、理論素養和理解的偏差，應看到這一框架除其本身特有的狹窄之外，它的意識形態涵義本身就很容易使學術成為政治宣傳的粗糙工具。

### 「從屬資本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鑒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學術意義的不完全和過於狹窄，本文試圖在這一概念原有內涵的基礎上提出一可替代的概念，即「從屬資本主義」，作為對近代中國110年歷史整體把握的新假說。這樣做原本也是作為學者的馬克思對世界資本主義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

眾所周知，《共產黨宣言》對十九世紀40年代，即中國近代肇始時的資本主義是這樣的描繪的<sup>⑫</sup>：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階級。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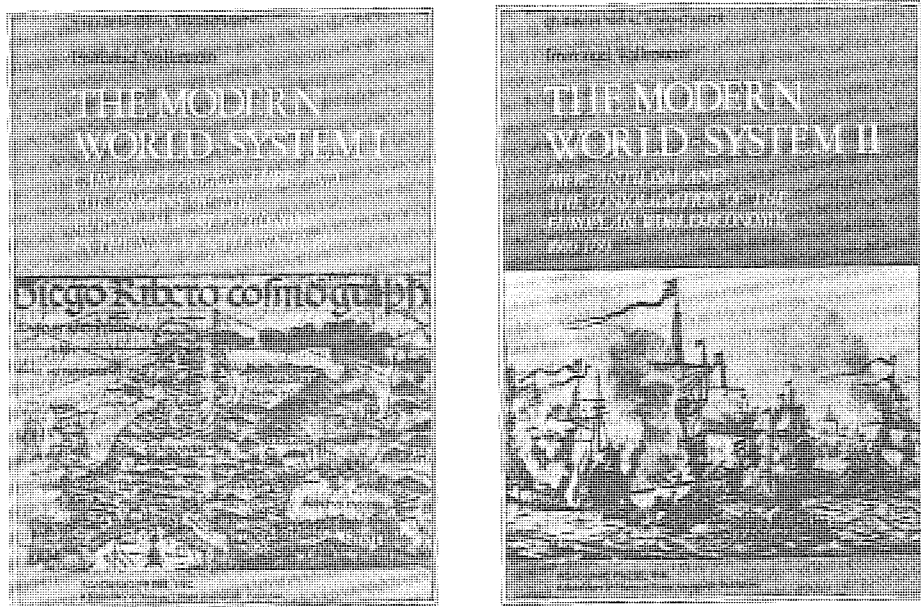


圖 華勒斯坦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核心、邊緣和次邊緣三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構成。

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指出在他那個時代，也就是近代中國的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在資本主義創造的這個世界體系裏，一些國家和地區被迫捲進去，這在馬克思看來只不過是「正像它（指資本主義生產，下同——作者註）使鄉村從屬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sup>⑫</sup>。在這裏馬克思強調了未開化和半開化國家的從屬性（subordination）。當今某些拉美學者由此出發研究拉美國家這一被捲入的歷史，形成了拉美依附學派。其著名代表人物安·岡·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1963年出版的《不是封建主義，是資本主義》中提出拉美國家資本主義是依附性的發展的；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核心（core）、邊緣（periphery）和次邊緣（semiperiphery）三種類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構成<sup>⑬</sup>。那麼，近代中國在這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是否一從屬的資本主義社會呢？

## 世界體系的出現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先有一自發地——或者說是主動地依靠自身物質資源和組織機構發展起來的地區或國家。這些地區或國家逐漸擴張，導致中心和邊緣地區——新的工業區、城鎮區和農村地區的出現。按照華勒斯坦的研究，1540-1640為這一體系的起源期，主要範圍在歐洲；1640-1745是這一體系的發展和鞏固，並向全球蔓延的時期；1815-1917是這一體系的全球擴展期；1917至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形成<sup>⑭</sup>。

實際上這正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方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不正是佔領，並逐漸改造所有工業和農業生產部門，創立新的生產部門，使運輸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嗎？這樣，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使在本國或世界範圍

內形成了核心地區，而且還形成了不同生產部門、不同生產領域的發達和從屬地位。馬克思曾稱荷蘭為第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也曾指出英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典型地點。我們知道，此時的荷蘭早已衰落，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一個次等的核心地區。所以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動態形成的格局之下，可以把近代中國110年歷史抽象概括為「從屬資本主義」，因為這是相對於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

## 近代中國國家地位的變化

相對於當時那些完全淪為殖民地，和未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侵入的國家和地區，這一概念也能成立。從國家地位而言，儘管中國自鴉片戰爭後被迫開闢通商口岸、承認領事裁判權、割讓領土、失去關稅自主權等，國家地位受到了極大損害，但中國始終是一主權國家。其中有些權利的喪失則是因為當時滿清政府的昏庸和無知，所以應具體分析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場景中，這正是他們濫用國家權力的體現。例如滿清當局就認為領事裁判權是夷官按夷法治夷人最方便之事；協定關約寫在條約裏可以免去許多爭執，且稅額又較中國以往固定的稅額要高；由於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出洋旅行和移民，所以也無須反對片面最惠國的待遇；而租界正可以避免華洋雜居所帶來的管理麻煩。

再舉目前有些學者所認為的由外人把持海關喪失了財政自主權為例。清海關原屬內務府，由於腐敗、貪污和無能，1843年後每年100萬兩的徵額都徵不足。1859年交由外籍人員管理，當年各海關稅收就達700萬兩，1871年後更超過1100餘萬兩。對於這類「海關現象」，梁啟超不無感慨地道出其中的原委：「中國之行西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sup>⑮</sup>況且，到二十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國恢復了關稅自主，收復了租界，1943年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並作為世界五強之一參加德黑蘭會議；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又成為常任理事國。所以，很難說近代中國110年的歷史就是「半殖民地」的不斷沉淪，相反應是中國不斷恢復自己的國家主權，進一步走向世界，鞏固自己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從屬地位的歷史。

另一方面，逐漸發展起來的從屬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方式也處於近代中國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試看農業：黃宗智的研究表明：「中國農業在十九、二十世紀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商品化了的中國農業，不再只受國內市場動向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世界性市場升降影響。」<sup>⑯</sup>工業：近代工業到1933年已佔全國生產總值的10.5%。其絕對值當然還不能與佔整個結構65%的農業等而論之，但是，1912-1936年的工業增長率為9.4%，是整個經濟中最為活躍的部分<sup>⑰</sup>。而此時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全部的近代工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主要資源和能源的開發和生產，以及相當部分被捲入世界市場的農業——已經資本主義化。很顯然僅用「半封建」就很難包容這些歷史現象，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

## 「從屬資本主義」：近代中國別無選擇的歷史走向

除了相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以及相對於那些完全淪為殖民地和未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納入的國家和地區而言，中國近代社會特徵是「從屬資本主義」之外，從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近代中國各自內在的發展邏輯來看，這一概念也可以成立。

### 列強剝奪中國的方式的改變

就這一體系的基本格局而言，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對擴充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剝奪落後國家和地區的方式在這時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表現在近代中國是由領土瓜分，強佔租界地轉變為幾個發達國家，即帝國主義列強共同



的經濟控制和財政支配，其轉變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最為明顯。例如英國想維護自己在華外交和佔商品輸出總額三分之二的優勢地位，所以竭力主張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美國於1898年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後，乘勢轉向中國。作為後來者，美國急於想為1883-1889迅速發展起來的產品尋求市場，所以它也要求其他列強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以及提出同中國「各個部分進行平等公正的貿易原則」的所謂「門戶開放」；日、俄原本希望從中國奪取更多的領土，所以反對自由貿易，但在滿洲歸屬問題上的尖銳對立，使雙方都無法有所作為。1895年三國干涉還遼，迫使日本不得不吐出已吞下的肥肉，表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任何一國想要獨佔中國都是不可能的。1900年10月，英、德簽訂了維持中國領土完整的協定。列強對華投資日益增多，直接政治干涉日益減少。1900-1913年中國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增長是在此之前32年（1868-1900）的兩倍多。而列強之間的相互爭奪更集中體現在獲取經濟利益方面。據雷默先生統計，1902年外國在華投資總額比重是英國佔33%、俄國佔31.3%、德國佔20.9%；到1914年英國仍佔首位，但德、俄、日、法開始接近，最突出的是日本，它在華投資比重從1902年的10%躍升到1913年的13.6%；到1931年，日本在華投資已接近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債權國，而俄、美、法則差不多，但美、日投資增長最為迅速——日為500%，美為400%<sup>⑩</sup>。正如赫德森所說：「根據這個方法，外國列強可以獲得殖民權力的實質，而不需要所有權的轉移。」<sup>⑪</sup>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初擴張方式不同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是依仗自己發達的高科技和雄厚的資本，通過對落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不平等交易，及在貿易方面的價格剪刀差，來使那些礦產品、農產品和初級產品加工國和地區的價值大量向其轉移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帝國崩潰，許多取得政治獨立的民族國家仍不得不依附於以前的宗主國，被迫提供初級產品、敞開市場以穩定其出口經濟的所謂新殖民主義的特徵，顯示了這一體系的動態發展過程。所以近代中國作為從屬資本主義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有着內在的必然邏輯的。對於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這樣做所獲取的利益比傳統的殖民地掠奪要大得多，對落後國家和地區的控制也深刻的多。

## 資本與技術的依賴結構

就近代中國而言，「從屬資本主義」也是歷史的別無選擇。因為近代中國工業的發展至少面臨着如費惟愷（Albert Feurwerker）所指出的四項困難——政府的軟弱和缺乏積極性；資金準備不足，無法提供大量的資本積累；技術落後和傳統的文化、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缺乏活力<sup>⑫</sup>。僅舉其結構性的短缺為例，1936年中國只能生產所需的88.8%的酸類，76.5%的碱類，60.4%的革制品，53%的玻璃，49.6%的電氣，40.4%的砂礦，38.9%的紙類，26.7%的毛紡織品，23.5%的機器，16.5%的車輛船艇，7.4%的染料，5%的鋼鐵，石油、汽油、煤油、柴油則全部依賴進口<sup>⑬</sup>。所以近代中國的發展注定要從屬於這一體系核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作為一歷史過程，

近代工業在起步之初，即十九世紀60年代，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廣購機器」的同時，又必須「精求洋匠」。原因十分簡單——「中國無一人曾身歷其事者，不得不問之洋將。」<sup>②</sup>資本的依賴何嘗又不是如此。1902年西方在華投資總數略超過5億美元，1914年則達24.83億美元，1936年為11.49億美元；外資的分佈為：投資於製造業的為1.4億美元，佔投資總額的13%，其他的有外貿（30%）、銀行保險業（25%）<sup>③</sup>，可見大部分外資是轉化為銀行貸款投入中國的進口貿易的。這在客觀上自然有助於緩解近代中國工業化資金奇缺的矛盾，但卻導致了近代中國在整個經濟結構上對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列強的從屬。表現為一方面是工業發展的極不平衡，大都集中於條約口岸及附近地區，廣大內陸地區則十分閉塞和落後。如蘇、遼、冀、粵、魯、鄂六省在1931年集中了中國礦業生產的55.1%（煤64.9%，鐵64.4%），紡織業的93%，繅絲業的92.6%，榨油業的86%，貿業的84%（外貿的92.5%），鐵路的53.4%，公路的42.1%，電線的42%<sup>④</sup>；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在1936年佔中國產業資本總額的78.4%，農業也因為滿足發達資本主義列強的需要，造成原料、茶、絲、蔗糖、大豆、烟草種植出口的畸型發展。所以對於近代中國來說，要麼停滯，要麼從屬於西方，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殘酷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邏輯如此簡單和直接地迫使近代中國把這種從屬性內化為本身內在的需要與自覺的選擇。正如嚴復所云：「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sup>⑤</sup>

## 結 語

以「從屬資本主義」作為對近代中國這110年歷史的一種抽象概括，其方法論意義在於我們用一種構造性的語言把近代中國那些紛繁複雜的歷史表面現象歸結為一些簡單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關係，這實際上也揭示了比現象本身所能反映出的更多內容，並為梳理、選擇、排列、評估歷史事實提供一種參考框架。

然而其理論意義卻遠非如此，應該看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對近代中國的任何一種理論概括都被高度意識形態化。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乃是1928-1936年的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論戰各方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抑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爭執不休，其現實目的自然不是為了學理上的拓展，而是為當時政治鬥爭，即近代中國是否應走以及能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取向，提供理論依據。這裏我並無意再捲進去，只是想在今天討論近代中國社會特徵時，剔除其非學術的附加成分。換言之，即從學術進步的角度，以平和的心態及理性的精神重新進行這一理論探索。



## 註釋

- ① 李澤厚：〈論中國現代三次學前論戰〉《走向未來》1986年，第2期。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 ② 李時岳：〈中國近代史主要線索及其標誌之我見〉《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北京。
- ③ 陳旭麓：〈關於近代史線索的思考〉《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北京。
- ④ 熊敏：〈過渡特徵與近代形態〉《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
- ⑤⑥ 龍溪：〈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北京。
- ⑦ 姜義華：〈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變遷軌迹的新探尋〉《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北京。
- ⑧ 徐泰來：〈關於中國近代史體系問題〉《湘潭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湖南湘潭。
- ⑨ 李時岳：〈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北京。
- ⑩ Sills, Davi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 Free Press, 1968.
- ⑪⑫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122。北京：人民，1976年。
- ⑬ 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⑭ Wallerstein, I.M.,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76, p. 18.
- ⑮ 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選集》頁12。上海：上海人民，1984年。
- ⑯ 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頁124。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⑰ Feuerwerker, Albert,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8, p. 8.
- ⑱ C.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 Baltimore: John Hopkin Press, 1933.
- ⑲ G.F. 赫德森：〈世界政治中的遠東：近代史研究〉，轉引自《新編劇橋世界近代史》第12卷，頁15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7年。
- ⑳ Feuerwerker, A.,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oder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45.
- ㉑ 羅敏權：〈十年來的中國工業〉《十年來的中國》上冊，頁134-53。
- ㉒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5冊，頁115。上海：上海人民，1981年。
- ㉓ 吉爾伯特·羅茲曼著，國家社會科學基本「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現代化》頁423。南京：江蘇人民，1988年。
- ㉔ 方顯廷：《中國的工業化》。上海，1931年。
- ㉕ 嚴復：《嚴復詩文選註》頁70。

胡成 1954年出生，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曾發表過有關史學理論、中國現代化問題、近代知識分子問題等數十篇論文。